

工人阶级国际 与欧洲战争

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供内部参考)

工 人 阶 級 国 际 与 欧 洲 战 爭

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高 年 生 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Eduard Bernstein
**DIE INTERNATIONALE DER ARBEITERKLASSE
UND DER EUROPÄISCHE KRIEG**

Verlag vo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16

根据莫尔出版社一九一六年版译出
((143)F12/P7)

工人阶级国际与欧洲战争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高年生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 · 字数 43,000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39 定价(七) 0.29 元

印数 0,001—3,000

出版者說明

伯恩施坦的这本小册子写于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不久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替德国修正主义者的背叛行徑辯护，为德国帝国主义者塗脂抹粉，积极吹捧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社会沙文主义政策。对于了解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第一次大論战的情况，这是一个有用的反面材料。

伯恩施坦在书中一再宣揚，德国帝国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无辜的。他說，把德国軍国主义“看作应当反对的首要敌人，这种看法的錯誤是昭然若揭的”。沾滿鮮血的德国帝国主义在他看来显得“洁白如雪”，而德帝国主义的头子威廉二世他认为可以称之为“真诚的和平之友”，只不过由于“战争贩子集团”的影响才参与了战争。因此，象当时的許多机会主义者一样，他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把它尽量渲染为一場“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

伯恩施坦沒法否认战前第二国际大会上作出的反战決議，他为了替自己的叛徒行徑辯解，編造了一系列遁辞。他說，由于現代条件的不同，工人阶级不可能以大规模群众罢工来反对战争。“今天，凡是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里发生战争，那里定会出現一种排除举行为阻止战争所必需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经济上、特别是在心理上的前提条件的情况”。这样，在平常情况下构成无产阶级特殊力量的东西，在战时“似乎变成了軟弱因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在“严重关头丧失了自己对社会意义的信心”。这种謬論正說明了伯恩施坦这个叛徒当时的心情，完全是他的“夫子自道”。伯恩施

坦还把机会主义者的叛变归因于看不到关于交战国情况的“无倾向的报道”，“交战各国的社会党突然沒有可能彼此协调或者至少是彼此了解它們的态度和对于事态的判断”。他又强辞夺理地說，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贊成軍事撥款，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贊同，各国社会党人对他們有所“誤解”。为了攻击坚持馬克思主义立場的左派，伯恩施坦还捏造了一个十分荒謬的理由。他认为，大的工人政党在国内必然要担负更大的“客观责任的压力”，因此不能象小党那样“随便以示威为目的而决定自己的投票”，从而誣賴一些东欧小国的左派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不負責任的行为。

伯恩施坦在书中还为其他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辯护，竭力否认第二国际的破产。他說，“只有那些不能体会自己祖国被一个强大的邻国用武力征服的民族心情的人”，才会責难社会沙文主义者。他公然声称：“那些被敌人侵犯的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国防内閣，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能加以譴責。”他断言，第二国际的破产只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內断絕了社会党国际的直接联系”。他还特别吹捧所謂“工人国际的中立的中心”，以此同列宁提出的建立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伟大号召相对立。

伯恩施坦的这本书竭力标榜“客观”，书中尽量引述各种文件的原文，以示“公允”。其实，这些調調完全是德国軍国主义御用学者的翻版。伯恩施坦在本书第八节中也供认說，德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品中还“缺乏一定最低限度的客观性的論文，无助于使外国对德国文化和德国学者的自由观察作出高度評价”，而他的这本书显然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由此可見这个修正主义者在这时已經墮落到什么程度了。

本书据图平根莫尔出版社一九一六年德文版譯出。原文书的頁碼排印在譯本頁边的空白处，以便讀者查核原文。

目 次

单行本序言	1
一、反战的群众罢工沒有出現	4
二、社会党国际历届代表大会关于战争問題的決議	6
三、国际社会民主党与俄国—奥地利—塞尔維亚的冲突	9
四、德法議會中的社会民主党与欧洲战争	20
五、比利时工党与战争	28
六、英国工人政党与战争	30
七、俄国和塞尔維亚的社会党人与战争	39
八、各中立国的工人政党的态度与战争	41
九、展望	51
后 記	53

单行本序言

构成本书内容的这篇文章，是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丛刊》战争问题专辑第二集中抽出来的。遵照朋友们的一再建议并承蒙丛刊发行者爱德格·霞飞教授惠允，现在我就以这种形式公诸于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这篇文章说不上已详尽无遗地论述了它所论述的题目。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在几个月以前就已完稿，因此只能很约略地谈到社会党国际中最近的事态进程。对十分重要的工会运动也只能作一些极其简略的评论，而就这个运动的特殊性和范围之广泛而言，本来是需要写一篇专题论文来论述的。本文所阐述的只是工人阶级国际各国支部在目前战争中的态度以及战争对于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反作用。我力图尽可能客观地阐明各国社会党人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对战争及其起因自然会产生何种特殊看法，并根据这些看法上的不同来说明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和集团在态度上的特点。从这种观点来评论这部著作，是作者至所希望的。

爱·伯恩施坦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于柏林雪纳贝尔格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在布鲁塞尔举行全体會議，以便就原定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在維也納召开的、由于战争状态而无法在那里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现在是否还要举行以及在何地举行的問題作出決議。除了奥地利以外，包括欧洲所有大国在内的十一个国家，都有社会党领导派来的代表参加这次全会；他們都是国际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胡果·哈泽(Hugo Haase)的建議，會議一致决定将这次大会日期从八月二十三日提前到八月九日在巴黎召开。此外會議还一致通过一項決議，号召各国工人再接再厉地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当天晚上，在罗雅尔跑馬場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胡果·哈泽(德国)、凱尔·哈第(J. Keir Hardie, 英国)、让·饶勒斯(Jean Jaures, 法国)、莫尔加里(Morgari, 意大利)、魯巴諾維奇(Roubanowitsch, 俄国)和特勒尔斯特拉(P. Troelstra, 荷兰)等人的講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些講話表明：欧洲社会党国际一致决心要竭尽全力来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还不到一个星期，世界大战果真爆发了。欧洲有六个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英国、法国、俄国和塞爾維亞，处于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状态。在社会民主党拥有議席最多的三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即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投票贊成政府的軍事撥款；在第三个国家即奥地利，他們根本未能做到使政府征求議會贊同战争。

从七月二十九日的決議同严酷的事实之間的这种矛盾中，显

而易見，人們不免會得出工人國際在道義上已經破產的結論。廣大公眾覺得工人國際已軟弱無力，不能在世界政治的重大問題上舉足輕重。它的和平綱領被看作是一種幻象，其非現實性已由它的領袖們自己的態度暴露無遺了。對於那些首先把極大的希望寄托於工人國際的和平意志上的世界和平擁護者來說，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至六日所呈現的現實，是一種冷酷无情的覺醒——誰想否認這一點呢？不過，這個國際的成員對於他們的道義力量和物質力量的真相卻應當有所交代。他們首先應當研究：他們的巨大的組織之所以喪失作用，究竟是出於必然還是由於疏忽，以及從災難深重的那一周的經驗和隨後發生的事件中，必須為他們未來的活動得出哪些結論。對於那些輕視國際的人，人們當然完全有權向他們大聲說：vos quoque et vos etiam pejus ——你們同樣沒有盡到責任，並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些掌握一切可能的權力手段的、專職的歐洲和平捍衛者，並沒有為此目的比工人組織多做一星半點，而工人組織所擁有的手段同他們擁有的手段相比卻是十分微不足道的。但是，姑且不論現在還不算這種反眼的時候，即使算清了這筆賬，也永遠不會使社會民主黨在自己家裡過去和

3 現在所受到的考驗成為多餘。社會民主黨完全有理由根據現有的經驗來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對它來說，它是否已按自己力所能及的限度發揮作用，這個問題也是同等重要的。

一、反戰的群眾罷工沒有出現

組織在社會民主黨內的工人階級能夠做些什麼來防止戰爭呢？工人階級在各國議會中都只占少數，所以它只有借助議會外的行動才能完成這一任務。我們知道，許多社會黨人在這方面想得特別多的是採取何種行動方式。在國內和國際的代表大會上都

曾經多次討論過，能否通過群眾罷工來消除戰爭。大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對此一直表示懷疑。在歷次國際代表大會上，德國代表都反對作出旨在把這種想法提升為口號的決議。如果我們說這個想法現在已被經驗所否定了，這也未必是言過其實。實際情況已經表明：今天，凡是在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里發生戰爭，那里定會出現一種排除舉行為阻止戰爭所必需的那種大規模群眾罷工運動在經濟上、特別是在心理上的前提條件的情況。目前的戰爭發生得如此之快，是出乎有關各國人民意料之外的。但是，在戰爭爆發之前的几周正是商業蕭條不斷發展、從而失業不斷增加的時期，因此，人們不可能用停止工作來謀求政治效果，這一點變得一天比一天明顯了。同時，資產階級報刊日益別有用心地加以渲染的國家大政方面的事件，卻越來越喚起那些素不關心的居民階層的民族情緒。這種民族情緒常常會比社會民主黨工人的和平傾向所依據的事先經過深思熟慮的感受更加自然地流露出來。在平常情況下對於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無產階級來說構成特殊力量因素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對它來說似乎變成了軟弱的因素：無產階級的客觀的聲音為受到一切非社會黨報刊支持的具有強烈民族情緒的群眾的高聲叫囂所壓倒了。因此，它在嚴重關頭喪失了自己的社會意義的信心，它突然發覺自己孤立起來了，並超過了它過去所想象的程度，或許也超過了合乎實際的程度。使得它的自覺性松弛的其它因素是：每逢政治形勢緊張到宣戰的時候，突然間就看不到足夠的有關同本國交戰的那些國家情況的無傾向的報道。因此，判斷戰爭的起因，判斷它是進攻還是防禦，就變得沒有把握，從而就不可能象所需要那樣迅速地決斷這一問題：反戰罷工是否會意味着反對正在合法地抵抗侵略的本國。這一切創造了一種氣氛，在一場戰爭爆發時，單是這種氣氛就足以阻止任何反戰罷工普遍化。此外，在這個時刻宣布的戰爭狀態，還使軍事當局有可能用武力和

严惩的办法来镇压任何想要宣传和組織反战罢工的企图。同时，基于上述理由，工人組織在这样的日子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发动群众罢工，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們忙于安插和救济已經失业的工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要号召那些还有工作的成員去罢工。只有那些对自己队伍中的失业工人毫不关心的粗暴的組織才会这样做，但是由于这些組織的成員始終是寥寥无几，群众是不会听从它們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那些有着良好工会組織的参战国中，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在这一方面作一次认真的尝试。虽然，我們不想断言，人民群众通过离开工場来反抗統治者所发动的战争的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能。但是毕竟可以和必須說，通过群众罢工，即通过斯图加特、哥本哈根等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所主张的形式来反对战争的思想，已經被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周的經驗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将来的工人代表大会的討論中，它多半要从議事日程中消失。

二、社会党国际历届代表大会 关于战争問題的決議

在探討社会党人的議會活动之前，我們首先应当看一看，社会党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給社会民主党的議會代表規定了在战争一旦发生时应尽哪些义务，以及打算怎样履行这些义务。

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經在好几次大会上討論过上述問題。浏览一下有关这一問題的決議，首先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決議中沒有任何一个直接涉及到面临的或已經爆发的战争的軍費表決的規定。对于一个可能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出現的問題，如同在战争問題上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人們始終沒有提出一种要求符合所有考慮到的場合的有約束力的規定，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可

以补充一句的话，也是明智的。诚然，一九〇〇年社会党国际巴黎⁶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和平、军国主义和常备军的决议中的第二点曾注明，作为“实施本决议所确定的原则的适宜手段”是：“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代表一定要投票反对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或殖民远征的任何开支。”

不过，军国主义和海上霸权主义都是抽象的概念，对它们可以作完全不同的理解。决议的法文本表达得更具体一些，它要求社会党议员“s'engagent à voter contre toute dépense militaire et toute dépense pour la flotte et les expéditions militaires coloniales.”（“必须投票反对一切军事开支以及建设海军和殖民军事远征的一切开支。”）

英文本也是如此。也许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同样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社会党议员也应当投票反对陆军和海军的一切开支。

这里就产生了解释上的争执。此外决议只申述了建议大家承担这项义务，决议本身却没有对这种义务作什么规定。与此相反，一九〇七年大会（斯图加特）的下列决议是直接针对发生战争的情况而作出的，并且要明确得多：

“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那末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必须在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统一行动的支持下，竭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爆发。当然，这些手段应当视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的尖锐程度而定。

“如果战争终于爆发，他们就应尽一切努力，使战争迅速结束，并不遗余力地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醒人民群众，从而加速铲除资本主义阶级统治。”

一九一〇年的大会（哥本哈根）重新肯定了这个决议，并且通

过給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下述指示对它作了补充：

- 7 “为了执行这些措施，大会責成該局，在战争危险迫近时立即采取必要步骤，以使有关国家的工人政党就防止战争的統一行动問題达成協議。

“在任何时候，当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間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而被征求过意見的有关国家的政党在抉择上表現迟疑和动摇时，只要有一个有关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提出請求，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书记就应当立即在布魯塞尔或根据情况在其他比較适宜的地方，召开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和社会党国际議會委员会的紧急會議。”

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依靠派遣代表参加国际大会的各国社会党所提供的經費来維持。它的常駐地点为布魯塞尔。由于地理位置适中，而且又是通用两种語言的中立国比利时的首都，布魯塞尔作为中央所在地显得特別合适。国际执行局常設委员会由比利时工人党駐該局的代表組成，常务书记是卡米勒·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他同委员会的其他三名委員埃特·安賽勒（Ed. Anseele）、路易·貝特兰（Louis Bertrand）、艾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一样，是比利时众議院的社会党議員。国际执行局迄今在各方面都表現得很出色，可是这一次只賦予它执行在战争前夕它所应承担的任务。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它的七月二十九日會議和这次會議所通过的決議。在那一天，社会党人当中一直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坚定的希望：世界大战将能通过在这方面認識一致的工人阶级的示威和行动而得以避免。人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参战的强国竟会进驻中立的比利时，从而使它也成为参战国。这种可能性人們甚至未曾順便提及过。可是現在已成为事实的战争居然一开始就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这是对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最沉重的打击之一，并且这不仅是就它的实际工作的可能性而

言。人是不能一劈为二的，由于国际执行局常設委员会的委員全都是比利时国会議員，因此对于抵御正在入侵和向前逼进的德国人以保卫比利时的忧虑必然完全支配他們的思想感情。作为比利时人民代表，他們完全同意：比利时不向德国所提出的假道向法国进軍的要求让步，并且也不象卢森堡那样只限于形式上的抗議，而是奋起抵抗。这并不等于他們一开始就站在法国那一边。不过不应忘記，比利时人如果同意德国的要求就会意味着甘心破坏自己的中立，而对法国來說則是一种敌对的行动。因为从战略观点来看，允許德国军队順利地通过比利时进軍法国所造成的危害，比反过来不允許德軍通过对德国所造成的危害要严重得多。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比利时委員由于外界的压力在心理上陷于矛盾状态。在这种矛盾的影响下，根据当时情况，他們几乎无法不象他們所做的那样行事。这样他們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由中立者变成参战者，并按照各人的秉性而成为狂热的参战者。只有那些不能体会自己祖国被一个强大的邻国用武力征服的民族心情的人，才会責难他們。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也由于个人的原因不再能行使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常設委员会的职权，最正确的做法无疑就是从比利时卷入战争的时刻起，把委员会的駐地在战时暂时迁到某一个現在仍守中立的国家去，并委托那兒的社会党人暂时接管委员会和書記处的任务。可是，正当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人突然看到自己处于两个敌对的营垒之中并被剝夺了彼此直接联系的一切可能的时候，誰有权作出这种决定呢？

三、国际社会民主党与俄国— 奥地利—塞爾維亞的冲突

尽管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常設委员会和書記处陷于瘫痪状态是

一件坏事，但是对于工人国际的思想联系来说，这还不是战争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更坏的是，交战各国的社会党突然没有可能彼此协调或者至少是彼此了解它们的态度和对于事态的判断。战争并未向今天的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什么心灵上的问题。如果发生了战争，那末对于他们来说，在敌对的国家里就只存在“敌人”。它们不满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对峙并且彼此尽可能从物质上损害对方，而且还试图一个民族接一个民族地在道德上尽可能地加以毒害。人们甚至不让对方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自己则以文化保护者自居，给现代文化的最高财富——各民族相互的交流与联系——不仅造成经济—社会的创伤，并且还不遗余力地造成精神上的创伤。用以证实真正的民族思想的东西，在别国国民看来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野蛮人行为。

工人政党要这样做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每当自己的国家卷入一场战争的时候，它们感到自己面临着双重任务：保卫自己的国家使之免遭征服和宰割，同时又不让自己同敌对营垒中的工人和人类伟大目标的其他承担者所共有的财富遭到损失。那些人同自己并肩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已经有几年或好几十年了，现在因为他们的国家试图诉诸武力来解决利益问题，而要它们把这些人当作“敌人”来仇恨，这是它们所难以做到的。因此，它们需要了解那些人的态度，连最低限度通过新闻手段彼此交换意见的可能性也中断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曾经有过这样的时
10 候，例如在我们这儿，人们还能看到的只不过是那些现在同德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所发表的文件中断章取义地摘下的片言只语，而对这些文件的全部内容仍然一无所知。那些摘录一再重述着各国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使得它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

我们的时代一般来说变化很快，在战争时期，事态的发展更是

剧变异常。象目前的这样一場战争就尤其是如此了。在这场战争中，欧洲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家彼此为敌，中欧两个大国向落后的沙皇俄国和西欧两个最先进的国家作战。今天只要翻一翻某个参战国的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把它同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日前后的同一家报纸比较一下，那末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最近的报纸简直是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人们所看到的关于国际关系的言语和观点大不相同，好像人们在八月四日喝了一大桶迷魂汤，把他們在那以前在这方面所说所写的一切全都忘光了。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多数其他参战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为了了解战争爆发时决定各国社会党人态度的立场，就得回顾一下战争爆发前的那些日子，回想一下社会党人当时的情绪。

当时的情绪究竟怎样呢？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照会；当塞尔维亚没有立即接受它的全部要求，而是建议就那两项使其国家独立成为问题的要求继续进行谈判或提交海牙法庭仲裁的时候，奥地利就立刻对塞尔维亚宣战。这样就激起了社会民主党以及除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外的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愤怒抗议。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用以谴责奥地利政策的语言，也许比那些现在同德奥两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的语言更加尖锐。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对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反应就是发出如下号召，这个号召首先发表在七月二十五日《前进报》的特刊上，次日又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报纸的显著位置上（现将这个号召连同原文中表示着重的黑体照录如下）： //

“巴尔干半岛的田野还在散发着成千上万被杀害者的血腥味，遭受洗劫和蹂躏的城市和乡村的废墟还在冒烟，饥饿的失业者、寡妇和孤儿还在到处流浪，而奥地利帝国主义所放出的战争恶魔却又在准备把死亡和毁灭带给整个欧洲。